



日月光华
哲学书系

05

罗蒂与普特南

新实用主义的两座丰碑

陈亚军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日月光华
哲学书系

05

罗蒂与普特南

新实用主义的两座丰碑

陈亚军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蒂与普特南:新实用主义的两座丰碑/陈亚军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日月光华·哲学书系)

ISBN 978-7-208-14046-2

I. ①罗… II. ①陈… III. ①理查德·罗蒂

(Richard Rorty, 1931—2007)-实用主义-思想评论②希拉

里·怀特哈尔·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

1926—2016)-实用主义-思想评论 IV. ①B712.59

②B0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5917 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封面设计 范昊如

·日月光华·哲学书系·

罗蒂与普特南:新实用主义的两座丰碑

陈亚军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8.75 插页 2 字数 364,000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046-2/B·1208

定价 88.00 元

“日月光华·哲学书系”

编 委

吴晓明 孙向晨 邓安庆

冯 平 李天纲 徐洪兴

张庆熊 张汝伦 张志林

执行编辑

孙向晨 林 晖

总序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思想之光，代代相传。在复旦哲学走过一个甲子之际，“日月光华·哲学书系”、“日月光华·哲学讲堂”应运而生。这既是过往思想探索道路上的熊熊火炬、坚实基础，以砥砺后学继续前行，亦是期许未来学术反思的灿然星陈，以哲学之力去勘探人类精神应有之高度与广度。为此我们当勤力不殆。

“兼容并蓄”是哲学成长的传统。复旦哲学建系伊始，胡曲园、全增嘏、严北溟、陈珪如、王遽常等诸位先生学识渊博，其来有自，奠定了复旦哲学的根基。他们不独立门户，不自我设限；不囿于教条，不作茧自缚；而是以思想和问题为导向，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由此造就了六十年来复旦哲学的特色。诸位奠基先贤始终秉持开放而专业的态度，强调严肃的学术训练，打破学科壁垒，追寻思想脉络，力图以真切而深邃的思考达致生活之本真，捕获时代之真精神。

“时代担当”是哲学不变的使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思想深入时代，对时代的根本问题做出积极的求索，是复旦哲学另一鲜明特色。真正的思

想探索和学术研究理应紧紧抓住与时代血脉相连的命题，提炼精华，不断对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做出回应。优秀的学者须有冷静的观察和深刻的反思，但这并不等于将自己封闭在无根的象牙塔中，而是真实切入时代命题的必备前提。切问而近思，人类的根本命题始终激荡于胸！

我们将以开放和虚心的态度来传承这些特色。“日月光华·哲学书系”不但收录了复旦哲院教师以往的代表作，也以面向未来的姿态吸纳复旦哲学人的最新力作。我们希望这一书系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容括从复旦求学毕业、在复旦从事教学和研究，以及到复旦访问讲学的学界同仁的优秀著作，成为推动汉语哲学界不断发展前行的引擎。“日月光华·哲学讲堂”，则希望将国内外学者在复旦所做的系列讲座整理成文，编撰成册，努力展现他们思想的源初轨迹，推进其理论贡献。以“日月光华”为平台，以学术为标尺，使国内外学者的优秀成果在共同的学术园地上得以生动呈现。这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需要敞开的思想姿态、精准的学术眼光以及异乎寻常的努力与坚持。我们希望把复旦哲学“扎根学术、守护思想、引领时代”的精神风格融入这两套丛书；我们期许它们不但能透彻地刻画出思想本身的发展历程，还将在更为丰满的历史背景中探索思想的作用。唯有如此，我们的“书系”与“讲堂”才能超出一般丛书的范畴，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捕获者、诠释者、推动者和反思者。

思想薪传在任何时代都是无声、艰辛和困苦的事业，隐于“日月光华”这一个美好愿景背后的深意尤为紧要：思想的守护与传承是“旦复旦兮”的意涵所在，精神的催生与创新是生生不息的事业。“书系”与“讲堂”的出版并不是书目的简单累积，也不是论题的无序叠加，而是思想的流动和生长，是已有思想激发新思想的创造过程，是不断厘清思想限度、拓展思想疆域的漫漫求索，是幽微星火燃成日月光华的坦荡大道。在几辈学人的共同理想和不懈坚持下，既往的成果已然成为了沉甸甸的责任。由

此，在决定“书系”与“讲堂”的名称时，我们选择将我们的理想标示出来，以此自勉，并期望人类趋向光明的理想，终将启迪人类的智慧，并照亮那条崎岖不平却让人甘之如饴的精神道路。

是为序。

孙向晨

二〇一六年九月于复旦

序言：新实用主义的左右两翼

说起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人们脑海中首先出现的名字一定是罗蒂和普特南。相较而言，罗蒂是新实用主义的开启者，他的姿态更显激进，借用政治思潮的分类术语说，他是新实用主义阵营的左翼革命派；而普特南虽然在英美哲学界成名更早，但却是在罗蒂的刺激下，皈依实用主义的。他的立场更加温和，是新实用主义阵营的右翼改良派。在罗蒂看来，普特南是他的同道，但还不够彻底，还残留着传统哲学的“世界”、“经验”、“真”等形而上学的累赘物；而在普特南看来，罗蒂的激进缺乏足够的理性依据，看似革命的换型其实并没有他以为得那么彻底，只有通过对传统哲学的基本概念如“世界”、“经验”、“实在”等的改造而不是抛弃，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哲学革命的目标。

一、激进的罗蒂

作为新实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罗蒂在分析哲学阵营中第一次公开打出“实用主义”旗号，并自称“实用主义者”。无论对他的评价如何，人们都不能不承认，他开启了一种新的视野，唤起了分析哲学对于实用主义的真正关注。但罗蒂是在“语言转向”的背景下复活实用主义的，这使他的实用主义与传统实用主义相比具有根本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来自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罗蒂的实用主义那里，有一种内在张力：一方面是对

传统实用主义的捍卫与倡导，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实用主义基本精神的背离。由于这种背离，他抛弃了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主义经验学说。

（一）语言的实践功能

新实用主义与传统实用主义的区别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罗蒂的回答是：“我们新实用主义者不再像老实用主义者那样，谈论经验、心灵或意识，而是用谈论语言取而代之。”^①“两者之间的中断是所谓的‘语言转向’。”^②用谈论语言取代替经验、心灵，是“语言转向”后绝大多数英美哲学家的共识，新实用主义者们也不例外。早期分析哲学家如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等人，对语言采取了一种康德式的理解方式。语言被视为先天的（a priori）、自成一体的，它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同时也构成了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屏障；我们不能越过语言达到世界，就像我们不能越过知性范畴去谈论世界一样。

对于这种思路，罗蒂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反对将语言视为独立的领地、静止的先天知识条件，赞同实用主义看待语言的方式，即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将语言看作一种实践工具，认为“杜威的作为工具而非图像的语言观，迄今为止，仍然是正确的。”^③人类使用语言的活动就是一种使用工具的实践活动：“提出一套范畴不是提供对某种非语言事实的描述，而是提供使工作得以完成的工具。”^④“不同的语汇犹如不同的工具”。^⑤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作为工具的意义。

语言在实践活动中，自我发展、自我淘汰，没有什么中性的根据来确

① R. Ror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New York: Penguin Putnam Inc., 1999, p.95.

② R. Ror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New York: Penguin Putnam Inc., 1999, p.24.

③ R.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xix.

④ R. Rorty, "Realism, Categorie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 (May 1962), p.313.

⑤ 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页。

定语言的意义。每一种新语汇的出现，都是对旧语汇的继承与超越。旧语汇在实践中被新语汇所淘汰，就像旧工具被新工具所淘汰一样。罗蒂把语言理解为在时间中不断自我丰富的过程，“这里新的每一步给予我们的是与上一步本质上同类的东西，不过它能使上一步的东西变得比以前更确定。……这个过程可以无限地推进下去。”^① 语言的意义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更新、延伸。这种无限推进没有必然的制约和方向：“新语汇是一种工具，它要做的事情，在发展出一套特殊的描述之前，是无法预见的——这种语汇本身帮助提供这一套特殊的描述。”^②

显然，这种理解语言的方式没有给语言和世界的分离留下空间。人们使用语言的实践活动——人的生存活动——取代了表象世界的认知活动。语言既是敞开世界的方式，也是世界自身的内容。在实践活动中，语言和世界融为一体。按照这种思维方式，“真”的性质不是语言对世界的映现或表象，而是如詹姆斯所说的，是对实践工具的褒奖，是对实践便利的赞语，是“好”的同义词。罗蒂指出，如果我们不再把语言和世界分隔开来，以表象主义的方式对待它们，而是以实践的眼光看待它们的话，就不存在语言和非语言世界的对应问题，而只有“有用”“无用”的问题。“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唯一的问题应该是‘它有什么用？’而不是‘它是真的吗？’”^③ 实在论与非实在论的争论不再是一种诱惑，因为“这些争论的解决，对于实践来说，没有任何影响。”^④ 与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话题的方式不同，罗蒂并不认为形而上学语言没有意义。在他看来，任何语汇，只要人

① 罗蒂：《实用主义、范畴与语言》，《罗蒂文选》，孙伟平等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② 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页。

③ R. Rorty, *Truth and Progres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45.

④ R. Rorty and P. Engel, *What's the Use of Truth?*, ed. by P. Savidan, trans. by W. McCuai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4.

们想赋予它们以意义，它们总是会有意义的。而他之所以拒绝这类讨论，“不是说它们缺乏意义，也不是说它们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只是说，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语汇没有实践用处。”^①

（二）世界的被放逐

强调语言的实践功能及历史演变，罗蒂的这一做法无疑继承了实用主义的衣钵，然而他并没有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在罗蒂的哲学中，隐现出两条不同的哲学路径：一条是黑格尔式的、实用主义的，另一条是康德式的、分析哲学的，二者既相互交织又彼此冲突。当罗蒂强调语言的实践—历史维度时，他是一个黑格尔式的实用主义者，这时语言成了人类实践史的一部分，语言的意义在时间中不断更新，这种更新和世界并不分离；语言不是世界的表象，而是世界的一部分。当罗蒂强调语言的自我融贯，强调语言的不可超越时，尽管罗蒂既不赞成康德的哲学路线，也不赞成弗雷格、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但实际上，他不知不觉又重新回到康德所搭建的哲学舞台上，回到一切还原为语言分析的哲学套路上，回到传统认识论的出发点上；“语言”和“世界”仍然被分割为两个领域，我们所能谈论的只是语言，世界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传统实用主义的语言—世界整体论，最终成了语言—语言整体论。

自康德之后，西方流行的世界观主要由两个要素构成，一个是来自外部世界的、被接受的“所予”（直观），另一个是来自“心”的^②、塑造“所予”的先天“概念”。在这里，“所予”是关键，它是世界对于人类认识的

① R. Rorty and P. Engel, *What's the Use of Truth?*, ed. by P.Savidan, trans. by W. McCuai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37—38.

② 这里的“心”是一个广义概念，主要指笛卡尔、洛克、康德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即把‘心’当作一种专门的研究课题，当作存于内在的领域，包含着使知识得以成立的一些成分或过程这种观念。”（罗蒂：《哲学和自然之境》，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页。）

唯一制约。所有关于世界的认识，都是建立在被动的所予和主动的概念基础上的，一旦所予瓦解了，不仅由所予和概念共同构成的世界观受到质疑，而且，试图从世界那里寻找知识基础的努力也注定要失败。

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已经表明，我们无法用世界对于人的直接作用作为我们关于世界信念的基础，世界对人产生刺激是自然的因果关系，而人对世界做出判断从而表达一种信念则是涉及概念、语言的规范关系。试图用前者说明后者，是犯了类似伦理学领域中摩尔所批评的“自然主义谬误”。^①但问题是，如果不能用所予作为信念的基础，关于世界的信念从何处得到证成？在此，戴维森的融贯论似乎提供了一条出路，它试图从语言内部而不是外部，寻找证成信念的理由：“融贯论的独特性就在于这样的断言：除了另一个信念，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充当持有有一个信念的理由。”^②戴维森详细地论证了这一基本主张，提出了语言与世界之间“无对照的符合”的口号。^③

罗蒂高度评价塞拉斯和戴维森的观点。^④他借助塞拉斯和戴维森的论

① W.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9.

② D. Davidson, *Subjective, Intersubjective, Obj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43. 关于戴维森的观点，参见“A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and Knowledge” in *Subjective, Intersubjective, Objective*;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D. Davidson, *Subjective, Intersubjective, Obj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37.

④ 罗蒂关于戴维森的诠释，在一些关键之处，并没有得到戴维森本人的认可。戴维森并不赞成罗蒂关于他的思想的激进诠释，不赞成从他的思想出发，推出否定外部世界的结论。他明确指出：“如果说我们（指罗蒂和戴维森自己之间——引者注）之间有分歧的话，我们的分歧就在于是否还保留着这样的问题：即便我们不能‘越过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语言去找到一种一致性以外的某种检验标准，’我们也仍然能具有并谈论关于公共外部世界——它不是我们出自我们自己的创造——的知识。”（D. Davidson, *Subjective, Intersubjective, Obj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41.）

证，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世界对于我们只有因果关系，没有语义关系。世界不能证成我们关于世界的信念。用“世界”来说明语言表达式的语义内容就像用“上帝”来说明道德判断的语义内容一样，不过是在寻找一种遁词而已。第二，能够证成我们关于世界信念的只能是另一种信念，语言的意义或命题内容，只能在语言内部得到确定。语言自我融贯，世界在此无能为力。在“我们”或“我们的语言”之内，可以谈论语义关系、命题内容，而在“我们的语言”之外，除了因果关系，再无其他。当我们要来求证我们关于世界的断言具有什么样的语义内容，我们的断言是否可以成立，或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人的断言时，“没有办法越过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语言去找到一种一致性以外的某种检验标准。”^① 第三，“世界不说话，只有我们说话。唯有当我们用一个程式语言设计自己之后，世界才能引发或促使（cause）我们持有信念。”^② 我们可以通过对信念之网的连续再编织，充分解释人类所有的探究活动。这个再编织的活动或许是由世界的刺激引发的，但如何编织却是由我们语言内部的程序所决定的。

在罗蒂看来，“世界”以及“指称”、“由世界决定的真”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说法或内容空洞的概念。“就‘世界’是指所有目前我们没有提出质疑的绝大多数信念被认为意指的东西而言，当然不存在任何反对它的论证”，^③ 因为“指称”在日常意义上，不过就是“谈论……”的意思，一个人所指的（referring to）也就是他所谈论的（talking about）。这个意义上的指称和实在并无关系，我们可以谈论实在的东西，也可以谈论虚构的东西。“真”或者只具有一种去引号的性质，即“‘雪是白的’是真的”，无非意味

① 罗蒂：《哲学和自然之境》，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5页。

② 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页。

③ 罗蒂：《世界的完全丧失》，《罗蒂文选》，孙伟平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着“雪是白的”，这种“真”并不指向世界、经验或任何语言之外的“证据”；或者具有形而上学实在论者所强调的内容，即语言和非语言的世界之间的一致，但这“恰恰是戴维森……的论证不让他（指实在论者——引者注）拥有的。”^①因此，“真”或“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个贫乏的、近乎可有可无的概念，“关于真……没有任何东西好谈。”^②它只能提醒我们，当下关于世界的信念将来会被超越，会被更好的信念所替代。^③

之所以说罗蒂没有真正克服康德式的思维方式，是因为他设立了一个非语言的世界，一个“不说话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信念证成，对于如何谈论世界，除了因果刺激，不起任何作用。当罗蒂透过实用主义或黑格尔的目光看世界时，他看到的是一个动态的交织着语言的丰满世界，语言作为实践方式和世界紧紧地嵌在一起，不可分离；而当他透过康德式的眼光看世界时，“世界”成了语言之外的一个抽象的幽灵。罗蒂采取的办法就是抛弃指称，抛弃世界，把“世界”变成一个乏味的、不值得哲学家为之操心的概念；让哲学家停留在语言内部，满足于语言共同体的内部交流。当有人质疑，这是一种语言唯心主义路线时，罗蒂回答说：“如果语言唯心主义被界定为否认‘客观证成条件’和‘客观的正确’这些观念的有用性，那么我实际上就是一个语言唯心主义者。”^④

① 罗蒂：《世界的完全丧失》，《罗蒂文选》，孙伟平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② R. Rorty,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3.

③ 罗蒂说道，“当一个人说‘那个信念得到证成，但或许不是真的’时，他应该被理解为，不是在某种人类的东西和非人类的东西之间做出区分，而毋宁是在人类可能发现自己所处的两种情形之间做出区分：一种是当下的情形，在其中信念显得被证成，另一种是假设的未来情况，在那里，信念显得不再得到证成。”（R. Rorty and P. Engel, *What's the Use of Truth?*, ed. by P. Savidan, trans. by W. McCuaig, p.41.）

④ 罗蒂：《实用主义哲学》，林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译文稍有改动。

罗蒂最终背离了实用主义方向。实用主义原本是一种不带表象主义色彩的实践哲学，按照这种哲学，语言本身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和世界不可分割。由于受到“语言转向”的影响，罗蒂并没有将这条实用主义路线贯彻到底。语言（意义）被从世界中剥离出来，我们直接谈论的是语言，世界对于语言没有任何证成作用；语言的语义内容只来自于语言内部的融贯，语言共同体成员的“意见一致”。世界对我们产生着因果刺激，但是，关于世界的所有信念并不来自于它。罗蒂主张，对于这样的世界，我们最好保持沉默。

（三）放弃经验主义

站在这一立场上，罗蒂对传统实用主义经验学说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一旦语言和世界成了分离的两端，选择便只能是非此即彼：要么语言，要么世界，经验不属于语言，故只能属于世界；既然世界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抽象概念，经验便不能成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彻底的经验主义应该被抛弃。在谈到杜威的经验学说时，罗蒂说道：“杜威的《经验与自然》……可以很容易地被看作只是一种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变种：一种温和的对于虚无主义胜利的重新表述。”^①这种理解与杜威的精神相差甚远。罗蒂始终不能接受杜威的经验学说，认为杜威的“经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残余物。^②虽然他清楚地意识到杜威和海德格尔在哲学旨趣上的一致，但他却完全没有看到，杜威的核心概念“经验”和海德格尔的核心概念“存在”具有强烈的“家族相似性”，以至于他在欣赏海德格尔“存在”的同时，

① R. Rorty, “Overcoming the Tradition: Heidegger and Dewey”, in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42.

② 罗蒂对詹姆斯也进行了类似的否定。而耐吾 (I. Nevo) 则对詹姆斯的经验主义做了整体论的解说。参见 I. Nevo, “James, Quine, and Pragmatism”, in *Pragmatism: from Progressivism to Postmodernism*, ed. by R. Hollinger and D. Depew,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5, pp.164—167。这种解说与罗蒂的看法是对立的。

却将杜威的经验学说当作一种坏的形而上学加以拒斥。

与海德格尔不同，杜威更加注重人类经验和动物活动的连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将人类经验和动物行为混为一谈。杜威不仅注重两者的连续性，同时也注重两者的差异。作为黑格尔的精神后裔，早在塞拉斯之前，杜威就已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所予”，认为“所予”必已渗透了思想、观念。^①如同罗蒂自己看到的那样，杜威后来甚至倾向于用“文化”取代“经验”。^②这表明，他对人类经验和动物活动的不同有着清醒的意识。而罗蒂的不足恰恰在于，他过多地强调了人类运用语言的活动与动物应付环境的活动的差异，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连续性，从而将语言当作一种自足的领域，使之与世界分裂开来。

二、温和的普特南

新实用主义家族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是“号称实用主义者的当代最重要哲学家”^③的普特南。尽管普特南一直竭力与罗蒂保持距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创立内在实在论时期，他的基本思路与罗蒂的想法非常接近。然而，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普特南提出一种类似詹姆斯“彻底经验主义”的“自然实在论”，明确划分了他与罗蒂的界限，显示出“实用主义转向”。可以说，罗蒂和后期普特南构成了新实用主义

① 杜威就此写道：“正统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谬误就在这儿。它假设存在着“所予”，感觉，知觉等等，它们先于并独立于思想或观念而存在，思想或观念是通过复合或拆分所予而获得的。但是，感觉或知觉（假设这些概念具有洛克经验主义所赋予它们的知识力量）的本性在于，它已经在本质上自然地是分离的或复杂的某种事物，暗示了并有赖于一种观念，一种意义。”（J. Dewey, *The Middle Works, 1899—1924*, Vol. 4, ed. by J. A. Boydston, Carbondale: Th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387.）

② R.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72.

③ R. Rorty, *Truth and Progres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13.

内部的两极：一是语言派代表，主张用谈论语言取代谈论世界，用融贯性取代客观性；一是经验派代表，主张通过对“经验”的改造，重新召回“世界”，使语言和世界融为一体，试图以此挽救实在论，挽救客观性。

（一）内在实在论的困境

20世纪70年代中期，受司寇伦定理的影响，普特南提出了“模型理论论证”。这一论证表明，“对于我们语言的各种诠释……可以在什么是输入物方面一致，而在什么是我们的语词实际所指方面大相径庭。”^①模型理论论证显然延续了“语言转向”的效应，它与罗蒂区别因果关系和语义关系，认为世界对语言表达式只有因果制约而无语义制约的观点是一致的。由此，语言与世界分离了。一种两难摆在普特南面前：或者接受模型理论论证，这意味着指称、世界的实际丧失；或者回到传统镜式哲学，求助于一个从外部决定语言指称的世界。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普特南在模型理论论证的基础上，创建了内在实在论：关于世界的谈论是在我们的语言框架内实现的，对象与事实只能在语言框架内得到确定；离开语言框架，我们无话可说；关于世界，可以有不同的语言描述模型，但无法找出唯一对应于世界本身的那一个；关于世界的描述方式是否合理，并不取决于它是否与世界对应，而取决于合理性可接受标准；这个标准是历史的产物，是在实践中形成并相对于语言文化传统的；但是，这种时间中形成的合理性可接受标准并不等于合理性本身，我们要通过合理性可接受标准来谈论“真”，但“真”不能还原为合理性可接受标准；“真”取决于理想条件下的合理性可接受标准。^②

① H. Putnam, *The Threefold Cord Mind, Body and 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6. 除“模型理论论证”之外，普特南还提出了著名的“缸中之脑论证”和“概念框架相对性论证”，这几个论证共同构成了他内在实在论的理论基础。

② 参见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第三章，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